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三重逻辑

姜志强

【内容提要】意识形态既是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也是一种充满实践诉求的理想生活图式，同时还是阶级利益的理论表达，因而在社会变革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纵观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史，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历代党的领导人都注重发挥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和反作用以引领社会变革，强调运用民主方法来获得民众的思想认同和政治支持，将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以保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普遍性，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三重逻辑。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建构探索虽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等多个历史时期，但贯穿其中的内在逻辑与实践理路是一脉相承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意识形态 思想领导权

作者简介：姜志强（197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1106）。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真正的革命往往都伴随着意识形态斗争和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探索虽然经历了多个不同历史时期，但却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贯穿于其中的实践逻辑、内在精神与基本方法是一脉相承的。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迈进新时代，面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严重威胁、国内社会思潮多样化的严峻挑战以及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等诸多问题，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逻辑理路进行系统的学理性总结，这无论对于加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巩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还是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意识形态能动性逻辑：在社会变革中 重视并发挥意识形态的引领功能

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既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也重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既强调各种因素的相对独立性，也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交互作用中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为了更好地说明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尤其强调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形成了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去解释社会政治、思想变动的一般模式。这一原理在逻辑上是严密的，但由于不同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理解角度的不同，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偏差。例如，第二国际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以及之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派”，还有俄国革命时期的“经济派”等，就曾对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做了庸俗化、机械化的曲解，他们将经济因素视为唯一并自发起作用的因素，崇拜自发性工人运动和经济斗争，否定政治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意义，取消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恩格斯晚年批判了“青年派”的错误理解，指出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

用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存在的，而上层建筑因素并非消极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甚至也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列宁在领导革命实践中，对俄国“经济派”及俄国工人运动中自发的工联主义倾向，进行了长期的揭露和批判，突出其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及掌握领导权的决定性意义，这一思路无疑对中国革命产生了较大影响。

尽管中国远离欧洲，不具备产生“自发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但上述争论在中国理论界或多或少产生过一些反响。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欧美的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主张采取温和方式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俄国“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等思潮，在中国理论界盛行一时。究竟哪一种道路和主张适合中国？不同思想的信奉者之间发生过不少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和手段问题，即进行和平改良还是暴力革命？二是道路和目标问题，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改良还是革命，毛泽东认为，那些崇尚缓慢改良、和平渐进的想法，不管是哪种性质的，也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①。实行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势必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痛楚和苦难；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指出，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虽然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了一些“新式工业”，但西方资本主义又勾结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允许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将世界历史推进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所以，尽管中国也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但中国的特殊国情及所处的时代环境，又决定了中国必然要争取社会主义这个光明前途（当然这个目标是分阶段实现的）。因此，“俄国式的方法”，即先组织共产党，使之成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然后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的方法最宜采用。同俄国革命一样，这个方法也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②。

以上述方式进行革命，必然要强调人的能动性，发挥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同时开展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斗争，这可以视为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但两者的目标任务和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政治斗争主要表现为武装斗争，其目标是用武力摧毁敌人有生力量，以取得“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意识形态斗争的本质是人心之争，其目标是凝聚革命力量、瓦解敌人斗志，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在毛泽东看来，这两种方式并无主次、轻重之分，但由于政治斗争是革命的中心任务，因此意识形态斗争要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工作来开展，而不能脱离或者偏离这个中心。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或文化的作用是独特的，因为意识形态作为“软实力”，往往决定着人心向背并影响敌我力量的对比，“革命者在政治、经济和武力等方面不如反动派实力强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而变被动为主动”^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强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④，要取得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总要先进行思想教育，这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关键环节。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自登上政治舞台开始，就以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为理论武器，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页。

③ 韩毓海：《“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1期。

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5页。

进攻，推动中华民族新文化朝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发展，这个“文化生力军”的锋芒所向，促成了一场从内容到形式都极为彻底的思想文化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①。对于这种突出文化或意识形态反作用的做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②

运用上述策略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中国革命同俄国革命一样，都不是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以意识形态为逻辑起点，这就形成了由意识形态到政治、再到经济的特殊历史逻辑，从而超越了那种由经济推及政治、再由经济和政治推及意识形态的一般历史发展顺序。列宁认为，这种特殊的发展形式并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相反，它体现了革命的极大灵活性，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经济水平，既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经济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③？所以，虽然俄国革命改变了历史发展的一般顺序，但并没有脱离“世界发展的总路线”，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进而预言，俄国革命具有的“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东西”^④，其革命道路又会有“新的特征”。

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把这个问题延伸到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反思上来。他认为，尽管在资产阶级进行革命之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封建社会中初步成长起来，但是，“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都是经过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顺序。这就是说，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都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⑤。

中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免遭资本主义的苦难，但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仍然落后，如果不能克服这种“先天不足”的问题，改变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那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仍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在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确立后，毛泽东就宣布，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接下来的中心任务就是“向自然界开战”，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适应中心工作的转变，党在社会各阶级、阶层中广泛掀起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潮，刘少奇曾代表党中央向全党发出号召，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向广大人民做宣传，去配合中心工作的完成”^⑥。毛泽东也做出了“政治工作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6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1、132页。

⑥ 《刘少奇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7页。

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论断。

应该说，此时中共领导人围绕经济建设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之后国际国内出现的政治新动向，中国与某些大国之间紧张关系的不断加剧，以及国内外形势的错综交织，影响了毛泽东对全局的战略判断，使他重新将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之后，他把阶级斗争问题看得越来越严重，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在此过程中，他提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这一不切实际的概念，将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开展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并要求不断在这一领域开展阶级斗争以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这就在处理意识形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上出现了偏差。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要求摆脱贫困落后、实现现代化成为全党的共识，顺应这一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果断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出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适应这一新形势，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建设思路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第一，在意识形态功能方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片面夸大意识形态或文化斗争作用的错误做法，对意识形态或文化的功能重新进行了科学定位。邓小平在新时期将意识形态纳入“精神文明”概念，作出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的论断，江泽民将文化视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想，胡锦涛提出“文化软实力”概念，将文化定位为综合国力中的核心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将思想文化视为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倡导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正是基于上述与时俱进的科学认识，才使意识形态在与经济、政治的相互交融中更好地发挥了引领社会发展的作用。第二，在意识形态地位问题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紧紧围绕中心工作来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根据经济建设需要和实践变化确定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要求、对策。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我们“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①。这就为如何发挥意识形态作用，指明了方向和思路。第三，在指导思想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方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强调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同时，也注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来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统一思想、指导实践，从而在不断发展的改革实践中引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境界。

二、意识形态领导权逻辑：运用民主方法 获得民众对于意识形态的认同

按照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但人民群众是由分散在不同行业、领域的众多分散的个体组成，如何将分散的社会力量汇聚起来，使之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力军，这是无产阶级政党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强调“理论掌握群众”和“教育工人”，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他们与“传统的观念决裂”；恩格斯晚年根据革命形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势变化，强调教育的作用和“群众的自觉参与”，此外也意识到争取农民的重要性；列宁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根本谈不上统一的组织和行动，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通过“政治灌输”激发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即使革命胜利后也要在“全体劳动者”中培养这种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为集中地研究了意识形态问题，他将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形象地比喻为“社会水泥”，将“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作为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并强调无产阶级即使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他也看到了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

概言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领导权的认识，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在思想上，他们深信没有共同的思想就没有共同的行动，因而应当把科学的意识形态作为共同的思想基础来凝聚社会力量；第二，在方法上，他们强调运用民主的方法获得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认同和支持，认为相对于以往的暴力方式，这种方法造成的影响更为深厚、持久和有效。

关于民众觉悟与民众团结的重要作用，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此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毕生致力于民主革命的孙中山，在临终前说过，欲达革命成功之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陈独秀也是为了克服旧式革命“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之弊端，才发起具有启蒙性质的新文化运动。但是，新文化运动向“救亡”的转变，并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说的，是“启蒙”尚未充分展开，便被“救亡”所压倒和代替^②，而是“启蒙”与“救亡”融为一体，只不过这时的“启蒙”已经由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转变为无产阶级启蒙范畴。对此，毛泽东有过清晰的阐述，他在1965年回顾井冈山斗争的时候说过，“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③。这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双重的，既有进行政治救亡的一面，也有思想启蒙的一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孙中山临终遗嘱所说的“革命仍未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全国人民没有被充分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因而造成革命力量总是弱于反动力量的局面。因此，毛泽东指出，战争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④。他认为，动员群众首先要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用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去教育群众，同时也要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落后性和软弱性，这样就会使群众在对比中认识到无产阶级思想的先进性和正当性，从而唤醒更多群众加入革命阵营。其次，方法问题至关重要，毛泽东认为，要使先进的文化或意识形态被群众认同，只能采用“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⑤，“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⑥，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并帮助群众组织起来。在这一问题上不能采取命令主义，运用这种方法什么任务也实现不了。因为命令主义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宣传、理论学习、整风运动、榜样示范、纪念活动、领袖宣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思想论战、正反面教育等多种民主方法，对

①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1页。

② 参考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9-36页。

③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0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6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5页。

民众进行教育启发；对于思想教育工作者、理论宣传者以及文艺工作者，要求他们在工作中要密切联系群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对于党外人士，强调不要盛气凌人地要求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他们。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上述做法及其效果，“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①，由此促使敌我双方“精神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进而引起双方武力对比的变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精神动因。

无产阶级要上升为统治阶级，离不开民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在夺取政权后也仍然需要群众的拥护，因为“在现代条件下，一个政权能否存在下去，并不简单取决于其武力和经济能力，而是取决于这样的权力是否‘合法’，其‘软实力’是否深入人心”^②。在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确立后，毛泽东也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能否巩固，也并不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在生产力没有发展起来、各种错误思想长期存在并面临西方和平演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也存在“文化合法性”动摇的可能性，因而“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③。但与革命战争年代不同，此时国家政权已经掌握在人民手中，敌我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种相对从容的和平环境中，更要注重方法的合理性，以动员民众投入更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中。因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要实行有领导的自由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和是非辨别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④。在科学文化领域，毛泽东提出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他认为，真理与错误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实行“双百方针”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对于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他主张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以及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去解决。

上述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方法，曾在短期内取得过良好效果，但此后，由于“左”的思想逐步占据了上风，毛泽东晚年也不自觉地把学术问题、文艺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把学术和文艺上的是非当作政治问题对待并用政治斗争方式来解决，因而打击伤害了文化界知识界一大批人的积极性。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指出，这种思想文化沉闷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妨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要推动改革开放，首先要破除各种旧观念和条条框框的束缚，营造敢想、敢说、敢干的氛围，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⑤，为此就要废除过去“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那一套做法，划清学术和政治、文艺和政治的界限，实行真正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对于人民群众中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尤其是学术研究中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强调，“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⑥；对于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邓小平指出，必须改变过去使文艺工作从属于政治任务的做法，尊重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在生活中要为文艺工作者创造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6页。

② 韩毓海：《“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1期。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8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9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4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5页。

条件，帮助他们提高水平以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和成果，相应地，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所面临的“衙门作风”和“行政命令”必须坚决废止。对于知识分子及其地位，邓小平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纠正了过去将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的政策偏差，作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结论，从而为广大知识分子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消除了政治障碍。上述策略方法，将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重新建立在民主基础上，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过去那种只突出意识形态政治权威、而淡化其理性权威，只强调整齐划一、而不尊重个人自由的局面，从而掌握了思想引领的主动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为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和思想文化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和多变性的发展趋势，我们党在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双百方针”政策和“三贴近”原则，提倡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人们在观念、内容和风格流派上积极创新。关于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党的领导人也多次强调要注意区分三者之间的界限，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以免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面对思想文化的多样性，我们党主张和而不同，建设和谐文化，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吸收借鉴各种思想文化的有益成果，既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积极传播正能量，又有力批判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负面影响，在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锋和交融中，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用中国梦来凝聚社会共识，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既讲一元化指导、又极具包容性的思想文化格局。纵观改革开放40年的思想领导权实践，民主和包容是贯穿其中的主线，运用这种方法，我们党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同时，也在理论上深化了对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的一大贡献。

三、意识形态普遍性逻辑：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要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阶级利益的理论表达，任何意识形态都代表着特定阶级的利益，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占据了统治地位，除了依靠政治权力，还在于这一阶级在上升过程中，往往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这样，它就俨然成为全社会的代表并带领社会全体群众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其他阶级之所以服从这一阶级的带领，是因为“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来说也是有利的”^①，于是借助于国家权力，这一阶级的意识形态就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是，新兴阶级在完成了改朝换代的任务后，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他们的利益不知不觉向着“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的方向发展了，这样就又同其他非统治阶级的利益开始产生矛盾了，而当这一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完全丧失了它的“普遍性”的时候，就彻底沦为“虚假意识”了。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条件下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大都要经历由“普遍性”向“虚假性”的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变，而无产阶级根本不同于以往任何阶级，它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并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利益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天然”的真实性，即人民性。无产阶级应该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无论在哪个阶段都要保持其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并把这个原则贯彻到底。

依照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人民一切反抗和斗争统统归于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领导他们进行斗争的阶级、集团、政党或领袖的理论、主张或策略，都不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有的甚至还反过来侵害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革命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消灭一切压迫和剥削现象、建立符合人民利益的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我们从事的革命战争是完全为人民群众利益服务的，只有依靠和动员群众才能进行这一战争，因此，要将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并得到他们的拥护，必须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①，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切身感受到党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同呼吸的，才会接受我们的革命号召和政治任务，积极支持革命。在此基础上，还要对群众进行思想宣传和政治教育，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利益”，了解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这些内容同他们利益之间的关系，使他们认识到我们党不但维护他们眼前的现实利益，而且还代表着他们长远的根本利益，这样，他们就会明白党是真正为他们的利益而战，他们革命的自觉性就会更高，就会更加信服我们党，“他们信服了，领导权就巩固了，否则会失去领导权的”^②。

在进行意识形态建构的实践中，毛泽东对如何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他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它必须把人民和民族的利益置于首位，“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③。为了维护好人民群众利益，毛泽东指出，第一，党的政策及其实践要符合人民利益，其正确性必须由人民群众来检验，“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④。第二，人民群众是生活在现实中的实实在在的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需求，要得到群众对于革命的全力支持和拥护，就要切实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抽象地谈论革命正义性对于动员团结人民群众起不到任何作用。第三，要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基础上获得人民的物质支援。共产党能给予人民的，“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人民的物质利益增加了，生活改善了，他们对革命的物质支持就多了，否则，“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⑤。第四，坚决反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毛泽东历来强调从严治党、治军和治政，用铁的纪律锻造革命队伍，他在革命战争时期颁布制定过《井冈山反腐败训令》《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等一系列行动准则和规章制度，要求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党员战士自觉遵守，对于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进行毫不留情地批评、处罚、严惩和纠正。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7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6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0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7、466页。

毛泽东上述关于人民利益的认识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普遍性”具体的、直观的体现，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但在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仍然面临着如何保持意识形态“普遍性”这个问题。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和“两个务必”重要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些新观点：第一，在如何增进人民群众利益问题上，既要代表群众长远的根本利益，又要维护群众眼前的现实利益；既要通过发展生产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又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不断提高群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第二，关于如何处理各方面利益之间的关系，既要注意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又要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既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又要协调人民内部各阶级、阶层、群体的利益矛盾，维护好他们各自的利益，做到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统一。第三，在利益分配问题上，反对平均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但也反对收入差距“过分悬殊”，主张对生活负担过重、经济特别困难的群众进行救济，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人的经济平等。第四，在物质利益和精神激励的关系上，既重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又反对过分强调物质利益刺激，主张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政治觉悟，增强劳动者的主人翁意识，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做到坚持物质利益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第五，对于全体党员干部，毛泽东要求他们牢记党的宗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重视改善民生，既“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也“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①。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认识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因而具有“普遍性”意义，但毛泽东晚年逐步偏离了正确思想路线，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升级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确立，“四人帮”甚至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口号。这些极端化的认识和口号，遮蔽了人民群众的真实愿望，伤害了他们生产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实践中也造成了严重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现象，大大降低了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曾指出，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跟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或许，就主观愿望而言，毛泽东晚年仍然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但实际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他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已经步入误区，这就使他的理论主张带有一定的虚幻色彩。

进入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将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作为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着力点。关于物质利益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凭空实现的，“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②。因此，要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必须改变过去片面强调道德精神作用的错误观念，发扬我们党维护群众利益的优良革命传统。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及其体现，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社会生产发达、物质产品丰富、人们共同富裕基础上，才能说是优越的。关于党的政策及其实践的判断标准，他认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这是压倒一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①。因此，应当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这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新时期我们党从根本上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认识，党的理论、纲领、路线和政策等，也都围绕着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展开，这就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回归到正确轨道上来。

捷克前副总理、经济学家奥塔·希克曾说：“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它不符合人们的利益和经验，就决不会成为这些人的意识形态。即使作为工人的意识形态而产生的共产主义也可能日益屈从于狭隘的政权利益，并僵化为与劳动者相异化的意识形态。”^②苏联之所以解体就在于执政者已经蜕化为既得利益阶层，苏共意识形态也丧失了代表人民利益这一核心精神，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经受住了考验，主要原因在于始终不忘代表人民利益的初心，通过改革开放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让人民看到了希望。中苏正反实践结果的鲜明对比，使我们党更加深刻体会到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对于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党在贯彻基本路线的基础上，更加坚定不移地带领全国人民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强调以人为本和关注民生，强调利益的发展、平衡、公平与协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以更好满足人民各方面需要为动力，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近期目标，不断解决改革发展中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以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总之，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我们党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新具有了无可争议的“真实性”和“普遍性”，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并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一定能跳出以往一切统治阶级及其意识形态“上升时期真实、执政之后蜕化”的历史循环，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根深叶茂。

参考文献：

- [1] 邢贲思：《意识形态论》，《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 [2] 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3] 王永贵：《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 [4] 朱继东：《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 [5]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6] 张士海、施秀莉：《毛泽东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

（编辑：刘影）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4页。

^② [捷]奥塔·希克：《第三条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现代工业社会》，张斌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5页。